

THE EASTWARDSPREAD PATH OF WANGYANGMING'S THOUGHT SPREADING ABROA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NFUCIAN DISOURSE

(王陽明思想域外傳播的海上路徑及儒學話語體系建構)



<https://doi.org/10.24412/2181-1784-2025-26-518-525>

Wu Dongli, PhD student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Lanzhou University

wudongliwx@163.com

Abstract: The extraterritorial communication of Wang Yangming's thought is mainly realized through the sea route, and its communication carrier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raffic network in East Asian waters, forming a communication pattern starting from the coast of China and radiating to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As a bridge of cultural exchange, port provides important support and guarantee for the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Yang Ming's thought. The eastward spread of Yangming studies broke the single dominant position of Zhuzi studies in East Asia, promoted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school differentiation within Confucianism, formed a school of Yangming studies with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its integration with local culture, reshaped the pattern of Confucianism in East Asia,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rough dialogue with western philosophy.

Keywords: Wang Yangming, Extraterritorial communication, Maritime Silk Road, Confucian discourse system

摘要: 王陽明思想的域外傳播主要透過海上航線實現，其傳播載體與東亞海域的交通網絡緊密相關，形成了以中國沿海為起點，輻射至日本和東南亞的傳播格局。港口作為文化交流的橋樑，為陽明思想的本土化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與保障。陽明學的東漸打破了朱子學在東亞的單一主導地位，促進了儒家內部的理論創新和學派分化，透過與本土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陽明學流派，重塑了東亞儒學的格局，並透過與西方哲學的對話成為跨文化傳播的重要資源。

關鍵字: 王陽明；域外傳播；海上絲路；儒家話語體系

作為中國文化輸出的典型，陽明心學是國際儒學中最具影響力和生命力的標誌，美國哈佛教授杜維明稱五百年來儒家的源頭活水就在王陽明。[杜維明, 2017:1]

阳明心学产生于正德、嘉靖年间，至万历、崇祯时期不断演变壮大，在阳明学传播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地域性”和“地域性”两种形态。[钱明, 2017:2]

而隨著海上絲綢之路陽明學傳到日本、朝鮮、越南等其他東南亞以及歐美國家，至今仍為中國文化面向現代性實現思想突進的強大動能，深刻影響著中國乃至世界。陽明心學的域外流傳與中晚明時期海上貿易密切相關，主要通過水域傳至東南亞諸國，尤其是借助寧波、泉州、廣州等主要港口向日本、朝鮮傳播。陽明心學域外傳播有著怎樣的海上路徑？有著怎樣的傳播格局？伴隨著心學傳播如何改變原有的哲學體系？對東亞儒學的現代進程有何影響？

一、交易與港口：陽明心學的域外傳播前提

陽明學的形成、傳播與發展，有兩種形態，即“水域”（“河”或“海”）是其域外傳播的主要載體，即“水域性”和“陸域性”。王陽明思想的域外傳播主要通過海上路徑實現，其傳播載體與東亞海域的交通網絡密切相關，尤其是以海上貿易為先決條件。

陽明心學的域外流傳與中晚明時期的海上貿易關係密切，通過貿易港口以水路輻射形態傳至日本、韓國等東南亞國家。明代的海上貿易是在唐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路上絲綢之路是在西元1世紀以前形成的，從西元2世紀到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陸上絲綢之路的延伸，在西突厥史料中由法國東方學家和漢學家沙提出的。[沙畹著, 2017:3]

在唐代中期以前，中國對外的主要通道是陸上絲綢之路，後來海上絲綢之路逐漸成為中外貿易往來的主要通道，因為戰亂和經濟重心的南移。作為當時最長遠的遠洋航線，海上絲綢之路經過一百多個國家和地區。唐代絲綢之路從廣州到達巴士拉（今伊拉克境內），將中國、東南亞、南亞、阿拉伯地區連接起來，成為溝通中西經濟文化的一條重要要道的絲綢之路由此拉開。[钱明, 2017:4]

對東南亞地區而言，相較於陸上絲綢之路的阻隔，海上絲綢之路在東西方交流史上有著更為重要的作用。[沙畹著, 2004:5]

明代海上貿易相較於唐宋更為規範，同時在倭寇侵擾下實現海禁政策。宋代由於指南針的廣泛應用於航海，使得海上絲綢之路進入了一個繁榮時期，貿易方式也從以朝貢貿易為主逐漸轉向市舶貿易。當時，廣州、泉州、明州、杭州等城市設立了市舶司專門負責徵收外商的貨物稅。元代海上絲綢之路繼續向西拓展，而明代洪武七年政府實行閉關自守，撤除了不少市舶司，禁商船出海貿易，海上絲綢之路一經中斷，海路開禁，對外貿統一歸國

家經營，直至明成祖恢復市舶司，直到明代成祖的恢復，才有了新的發展。而鄭和七次奉命下西洋後，從世界航海史上來看，中國航海處於世界航行史上龍頭地位的亞洲、非洲和廣州-拉美西東兩條航線，而廣東從廣東到沿海，成為當時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角。由廣東向海洋地區延伸的遠洋航線，為海外傳播陽明心學提供了基礎，使中國航海在世界航海史上處於領先地位。中國與世界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在明代海上絲綢之路進入承前啟後的階段，達到了一個新的高點。[何芳川, 万明 1998:6]

海禁主導下卻催生大量走私貿易，成為之後陽明心學傳播除官方外第二條重要途徑。明朝建立之初，實行了嚴厲的海禁政策，目的是打擊方的國珍餘部勢力和防範倭寇在沿海地區的掠奪，規定凡下海經商的人，都要以謀反的罪名重罰，結果卻造成了偷渡的暗潮。沿海居民冒險違禁，王直等海商武裝崛起，形成亦商亦盜的龐大集團。海禁政策的推行，對於沿海地區居民來說，無異於將自己的生存之路斷開。《天下郡國利病書》記載道：“海邊的民眾生計無望，加上饑荒肆虐，窮苦的人民常常投海為盜，聚集成群，成為亡命之徒。”[韓樹宗, 2023:7]

為了生存，海民們不惜冒著生命危險，違禁出海，與海外進行走私貿易。《天下郡國利病書》提及：“如今的海盜，人數動輒上萬，雖然大多以倭賊自稱，但實際上真正來自日本的不過數千人，其餘都是一些毫無廉恥的中國流氓蜂擁而至而已。”大略福之漳郡，以海為田……自嘉靖二十年起，海禁愈加嚴格，盜賊團夥也愈發猖獗。”

相較而言，朝貢貿易雖為官方形式，但不及走私貿易有市場活力。作為明代官方認可的對外貿易形式，朝貢貿易限制條件較多，不能很好地滿足境外商品的市場需求。明初，三令五申嚴禁沿海軍民出海通商，海外通商被明廷徹底掌握。一直到洪武十六年，才開始給朝貢國家頒發“勘合號簿”；至永樂二年，又置“信符金牌”等外土官，以此等憑證，皆為買賣時所據。這種將買賣關係納入朝貢形式的朝貢買賣，無疑是對海外貿易的一種嚴重破壞，也是對宋元以來民間繁榮的一種顛倒。[衷海燕, 20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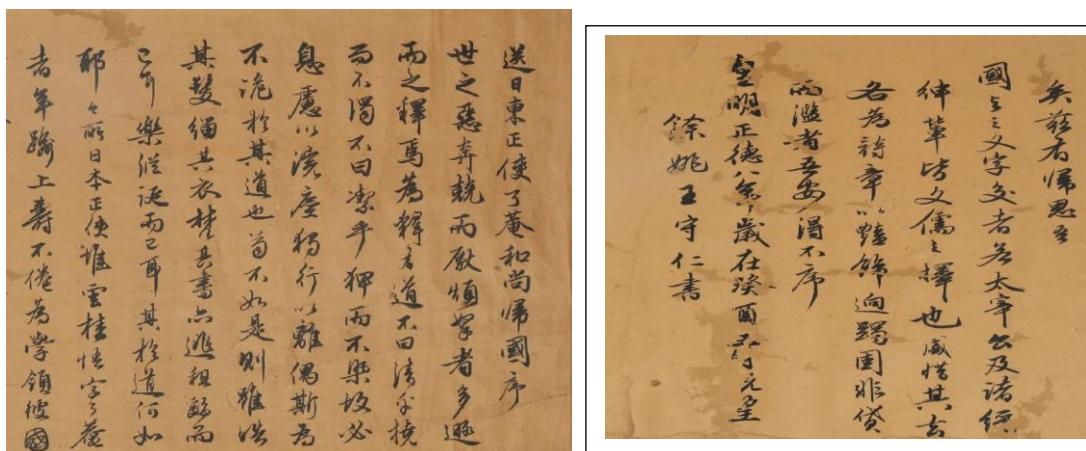
況且，朝貢貿易有著嚴格的貢期、貢道和朝貢人數限制，這種限制使得朝貢貿易的規模和頻率都極為有限，難以滿足國內日益增長的市場需求。這樣就催生了多種多樣的走私貿易，給明朝的海防和經濟秩序帶來巨大衝擊的同時，也給思想文化的廣泛傳播帶來可能。陽明學正是通過海上貿易傳入日本，後經貿易往來與文化交流的持續推動，在日本形成了獨特的思想流派。

二、隆慶開洋：陽明心學東傳萌興發展

陽明學流入日本，對日本的思想解放、社會變革、實踐精神及文化融合等方面都有重要影響。近代著名學者章太炎說“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為其先導。”[顧炎武，1985:9]

梁啟超也說“日本維新之治，心學之為用也。”在國外的無數仁人志士為之沸騰，並列東洋學與西洋學，並以昔日的學生為師，在辛亥革命等事件中掀起了一股學習日本、效仿陽明心學的風潮，影響深遠。王陽明心學在日本的流傳，大約是在其去世八十多年後，其作品《傳習錄》傳入日本，改變了日本原有的儒學格局，直至明治維新都為其提供理論武器。陽明心學是從何時傳入日本？又有怎樣的流傳路徑？

日本的陽明學傳播過程，最早可追溯到明代王陽明與日本高僧庵桂悟的交往，後又經中江藤樹等學者發揚光大，在日本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陽明學流派。明代正德六年(1511年)，日本五山派高僧，使庵桂悟率使團出使明代，進行勘合貿易，是日本的五山派的高僧。正德八年(1513年)五月，在寧波阿育王寺，王陽明與弟子徐愛相約庵桂悟道，相談甚歡。由此，王陽明提出了心學命題，如《心即理》、《知行合一》等王陽明《送日正使庵僧歸國序》相贈，此文雖未收入《王陽明全書》，不過在師蠻的《本朝高僧傳》、伊藤威山的《鄰交征書》、齋藤拙堂的《文話》中都有收錄，在日本廣為流傳，被視為陽明學東傳日本的開端。儘管庵桂悟歸國後次年辭世，未能直接傳播陽明學，但此次接觸為陽明學在日本的傳播奠定了基礎。



(手迹节录《送日使庵僧归国序》，藏于日本五岛美术馆大洞急纪念文库藏)

雖然庵桂悟在日本宣介陽明學中沒有留下直接的文字資料，但在中日文化交往史上，中日兩國的佛教僧團在某些特定時期，不僅擔當著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政治使命。中日兩國通交的“佛教外交”色彩很濃，這在明朝是有的。日本加入明廷貢制後，在京都“五山”禪僧中也推舉了其貢使團的正副信使。

就是這樣的背景和機制，為王陽明創造了條件，讓他和庵桂悟禪師在日本東福寺相遇。井上哲次郎評價說：“在哲學史上是絕對看不見的事實，桂悟是親與陽明接觸的。”同樣大膽推斷的還有川田鐵彌。“如桂悟禪宗外，兼傳程朱之學、餘姚之學，論知行合一之義，為日本王學所宣導之矢，其人之所至也。”

中江藤樹、三輪執齋等在庵桂悟之後，成為日本陽明學主要的推舉對象。朱謙之先生曾評價說：“日本陽明學始於中江藤樹，由庵桂悟禪僧始於溯源。”“良知”而全身心地服膺，與門生熊蕃山一起，為陽明學的研究與傳播而努力，形成了中江著名學派，是我國著名的中江學派。[田培棟, 2008:10]

德川幕府時期，朱子學被奉為正統，陽明學等“異學”被壓制，“諸子學”被認為是“異學”。但儒學內部的分化，促使日本的陽明學開始尋求發展的空間。他早年信奉朱子學，後轉而研習陽明學。中江藤樹在《年譜》中提到，他在 37 歲時閱讀了《王龍溪語錄》，從而開始接觸陽明心學。他曾作詩寫道：“致知格物的學問雖然新穎，然而十有八年間我的理解仍不夠深刻；幸得天佑，讓夏陽帶來溫暖，如今我的心境似乎恢復了生機。”“他積極普及陽明學，更重要的是提出了‘心為萬物之本體’的觀點，把陽明學的‘心即理’思想和日本文化結合起來，為日本的陽明學奠定了基本的格局。之後更有三輪執齋和佐藤一齋進行宣傳。《標注傳習錄》由三輪執齋出版於江戶時代中期，使陽明學廣為日本學者及下層武士所傳习，流傳至今。這一舉措打破了朱子學的壟斷地位，為陽明學的發展提供了文本支持。到 19 世紀中期，佐藤一齋作為幕府的儒官在日本推廣陽明學，門徒人數多達 3000 人，西鄉隆盛是其中最為著名的。佐藤一齋提出了“良知即元氣之靈”的觀點，將陽明學的“良知”說與日本的氣本論結合起來，形成了日本陽明學特有的自然觀，認為“良知即元氣之靈”是日本這為明治維新時期陽明學說奠定了理論基礎，使陽明學說成為變革的精神發動機。

那麼陽明學是如何傳入日本的呢？自了庵桂悟後的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由日本學者開始研讀、翻譯的陽明學著作，這些中國刻本逐漸通過海上貿易的方式傳入日本，奠定了陽明學在日本傳播的基礎。明代解除海禁、准許民間私貿的隆慶元年(1567)，使明代的海外貿易迅速發展，大量白銀流入中國，同時也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史稱“隆慶開關”，是明代的海關貿易政策的組成部分。同時，隆慶年間朝廷正式承認陽明學。陽明去世後其學說一度被官方打壓（如嘉靖初期被定性為“邪說”），但隨著時間推移，陽明學逐漸獲得官方認可。隆慶年間，陽明學在科舉考試中的地位已超越程朱理

學，成為士人必學內容。這一變化反映了官方對陽明學價值的重新評估，為其思想傳播創造了制度條件。隆慶年間海上貿易的繁榮為陽明學的傳播提供了更廣闊的舞臺，使得陽明學能夠隨著商船和傳教士的腳步傳播到更遠的地區。隆慶開關後，隨著海上貿易的繁榮，西方傳教士如利瑪竇等紛紛東來。他們在傳播基督教的同時，也對中國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並將陽明學等中國思想文化介紹到西方，成為歐洲陽明傳播的開始。

而陽明學日本傳播主要借助海上貿易東洋航線。明代主要有三条海上丝绸之路通商路线，一是向东，通往日本和朝鲜。这条航线在明代以丝绸、瓷器、书籍等商品为主的唐宋时期已相当成熟。（東洋航線）一條是向南，從東南沿海到東南亞諸國；一條是向西，抵達印度、阿拉伯半島，最終到達非洲東海岸，這兩條線上中國的茶葉、絲綢、陶瓷大量輸出。（南洋、西洋航線）相較其他航線的絲綢、瓷器，三條航線中東洋航線貿易往來書籍交往最多，這也為陽明心學率先傳播至日本、朝鮮奠定基礎。而其中港口成為陽明心學思想域外傳播的集散地。港口作為海上交通的核心節點，是陽明思想域外傳播的起點。

阳明学经浙东大运河，由宁波入海，并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接，得以向东北亚及其他地区进行传播。而陽明曾在寧波遍訪名山、講學論道，其學術思想對寧波本土文化浸染頗深。寧波作為區域文化的輻射源，推動了陽明思想在域外的本土化發展。阳明学传入日本近江地区(今京都府治)后，结合当地文化，形成阳明学流派，具有地域特色。例如，在日本，阳明学最初仅是儒者个人所掌握的学术体系，后来随着实际需求的增加，逐渐演变为武士阶层的思想武器，走上了学术化与功利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三、打破傳統格局：陽明學東亞傳播的價值確立

陽明學的域外傳播深刻改變了東亞儒學格局，它打破了朱子學在東亞的單一主導地位，推動了儒學內部的理論創新與學派分化，同時通過與本土文化的融合，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陽明學流派，最終重塑了東亞儒學的思想版圖。陽明學的域外傳播首先是打破了朱子學在東亞的單一主導地位。在陽明學傳入之前，朱子學在東亞儒學中佔據主導地位，其理性主義、格物致知的路徑深入人心。在陽明思想傳入日本之前，朱子學已在該國經歷了長期的傳播與發展，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論體系，並成為江戶時代的主流思想。

日本朱子學起源於鎌倉時代(1192-1333)，此時朱子通過禪宗臨濟宗傳入日本，但最初只是作為禪僧的補充學問而依附於佛教制度而存在的朱子學，

是朱子學的起源。室町時代(1336 年-1573 年)後期，五山禪林的博學之士開始系統學習竹子學，足利學校的教學重心更偏向於易學(Easy School)。江戶時代初期(1603 年)，德川幕府為了強化統治，將竹子學設置為官方意識形態。藤原惺窩通過批判佛教獨立性，首次將朱子學剝離宗教束縛，構建獨立學說體系。其弟子林羅山進一步將朱子學從個人修養提升至治國理念層面，推動幕府頒佈《武家諸法度》，使朱子學成為武士階層必修學問。這種制度化過程使朱子學在日本形成了區別於中國以文人士大夫為載體的傳播模式。同時，日本朱子學在傳播過程中，實現了與本土神道思想的深度融合。

然而，陽明學強調“心即理”“致良知”，主張通過內在體驗實現道德自覺，這一思想為儒學內部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三輪執齋自江戶時代中期起，於 1712 年刊印了《標注傳習錄》，從此《陽明學》在日本更廣泛地傳播和普及，為日本廣大文人士大夫和下層武士所熟知。德川幕府時，朱子學被奉為吏部尚書，陽明學則被壓制為不正派。然而，陽明學並未因此消亡，反而與朱子學形成了抗衡的態勢。佐藤一齋等陽明學者，雖表面上標榜諸子學，私下裏卻深研陽明學，人稱“陽朱陰王”(“陰王”)。

陽明學迎來幕末明治維新時期的新高潮。陽明學在幕末成為日本維新志士普遍信奉的哲學思想。他們運用陽明學作為理論武器，宣導尊重皇權和抵禦外侮，或推翻舊政權、建立新國，從而推動了明治維新的實現。在此期間，陽明學影響了日本社會的變化。推伊藤博文是明治維新時期影響最大的人物，陽明心學是伊藤博文最為推崇的人物。此外，被王陽明學說折服的還有日本“武聖”東鄉平八郎，專門佩帶了一方篆書“拜陽明平生”的印章。而大鹽平八郎之亂，則是從理論上把陽明學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學說落實到實踐中的最典型的代表。

進入近現代以來，陽明學在日本繼續得到學術界的研究和普及。一些學者如岡田武彥等，致力於陽明學的日本化、庶民研究，發展出與山崎暗齋創立垂加神道的不同神儒融合路數，以朱子學為材料。陽明學對日本社會的影響深遠而廣泛，它不僅塑造了日本人的心性與行為方式，還對日本的教育、政治、經濟等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日本，陽明學逐漸擴大並真正構成日本社會思潮的高峰期，尤其是在明治維新社會激烈變革之際，不少倒幕和維新志士服膺陽明學，推動了日本社會從封建向近代的轉型。在韓國，雖然陽明學傳入時間較早，但聲勢影響遠不如日本，然而它仍然對激發思想活力、促進學術自由起到了積極作用。

于是，陽明學的域外傳播使東亞儒學的思想版圖得以重塑。在日本，陽明學成為與西方精神傳統和哲學思想異質對話的國際諍友，為日本近代化進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在韓國，陽明學在促進國家社會穩定和經濟文化發展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作為與處於正統主流地位的諸子學相抗衡和形成的思想流派。同時，陽明學的傳播也促進了中日韓三國儒學之間的交流與對話，推動了儒學的多元化發展。

結語

陽明學在域外傳播過程中，不僅塑造了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的思想版圖，還通過與西方哲學的對話推動了跨文化交流，實現了理論創新、社會變革及文明互鑒等不同緯度的價值意義。由此，形成了一種“東亞陽明學”，即非實體而是在東亞地域的傳播、展開以及轉化等思想現象。[章太炎著，2009:11]

陽明學的域外傳播以“水域”（海域）為主要載體，以港口為中心向區域輻射，形成了網狀傳播路徑。而陽明學強調“心即理”“致良知”，主張內在體驗與道德自覺，為儒學內部提供新視角。在日本，形成注重實踐的學派；在韓國，發展出實學特徵；在歐美，則通過比較哲學研究，如陽明與康德、斯賓諾莎的對話，拓展了儒學的解釋空間。

參考文獻：

1. (美)杜維明.青年王陽明：行动中的儒家思想[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1.
2. 钱明.阳明学在域外的传播、展开与影响[J].人文天下,2017,(23):18-29.
3. (法)沙畹著；冯承钧译.西突厥史料[M].北京:中華書局,2004:5.
4. 何芳川、万明.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54.
5. 韩树宗等.海洋文明简史[M].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23:164.
6. 袁海燕.明代海上丝绸之路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20:45.
7.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M].上海:上海书店,1985:159.
8. 田培栋.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86.
9. 章太炎著；书林主编.章太炎文集[M].北京：线装书局，2009:225.
10. 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94.
11. 吴震.关于“东亚阳明学”的若干思考——以“两种阳明学”问题为核心[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9(02):13-25.